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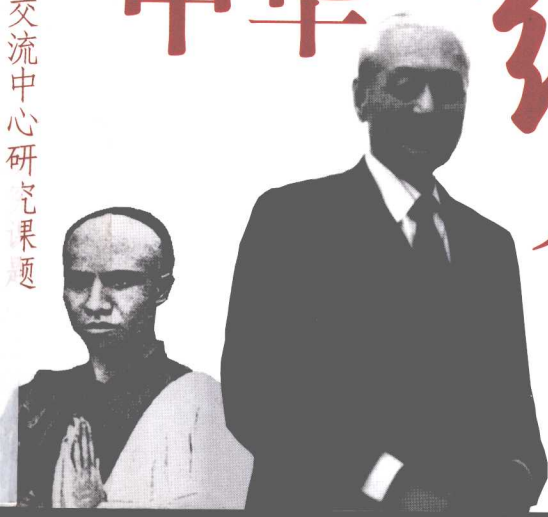
佛缘 中华人物志

朱封鳌 主编

ZHONGHUA
FOYUAN
RENWUZHI

上海辞书出版社

天台山文化交流中心研究课题



天台山文化交流中心研究课题

中华 佛缘 人物志

ZHONGHUA
FOYUAN
RENWUZHI

主 编 朱封鳌
副主编 韦彦铎 郑鸣谦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佛缘人物志/朱封鳌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5326 - 2954 - 1

I. 中... II. 朱... III. 佛教—人物—列传—中国
IV. 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2269 号

责任编辑 施嘉喆
助理编辑 吴 慧
装帧设计 何香生

中华佛缘人物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375 插页 1 字数 226 000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2954 - 1/B · 162

定价: 22.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6511611



前言

按照学术界一般的说法,佛教传播到中国的时间始于汉代。传入中国后,魏晋而兴起,南北朝而盛行。至陈隋之际,形成若干宗派,自成体系。它不仅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站稳了脚跟,还逐步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儒、道鼎足为三,相互交融,左右着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潮流。佛教不是靠政治权力的推广,而是主要靠自身的优势 and 对中国国情的高度适应能力,通过正常的文化交流渠道,赢得了帝王、公卿、名流和广大群众的信仰。



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与佛有缘的人物很多。我们认为称这些人 为“居士”,还不如称“佛缘人物”更为合适。因为“居士”一词在古印度 只是指四种姓中的吠舍阶级,或有财有德者;在中国古代,据《礼记·玉藻篇》和《韩非子·外储说左》中记载,则只是指居家饱学、隐居不仕之人。在佛教传入中国后,才被赋予新的意义,即指上层信佛人士。然而 本书中所记述的人物,有的确是“居士”,有的则不以“居士”自居(如有的佛教学者)。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大部分人因家产富有,故可以予佛教以经济方面的有力支持,因有社会地位(包括政治地位),故能为佛教作政治上的保护;有的作为社会上层分子,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佛教教义的阐述因之而愈详,弘扬因之而愈广,教法因之而光大。通过他们与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联系,佛教教义和要旨深入传播到全国各地。所以,我们总称这些人为“佛缘人物”。

在我国历史上,与佛有缘的人物很多,其中不乏佼佼者。不少朝代,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州县的刺史、县令,普遍崇奉佛法。有些虽是



政治上的强硬派,如维新变法的王安石、辟佛丞相张商英、“铁面御史”赵抃、爱国英雄宗泽等,但虔信佛教;著名大画家、文学家、艺术家如顾恺之、戴逵、张僧繇、吴道子、白居易、欧阳修、苏轼、苏辙以及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等均信奉佛教;哲学家、教育家如朱熹、晁迥、文彦博、钱象祖等等,更是对佛法深信不疑。这些人不仅使自身获得解脱自在,还为护法弘法、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作出很大的贡献。

到了近代,不仅僧人和居士继续研究佛学,而且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学者也竞相研习佛学,并将佛学思想作为自己建立理论体系的依据。一些重要的文科大学都开始讲授佛学课程,如梁漱溟、汤用彤、熊十力等均先后在北京大学开讲佛学;蒋维乔在东南大学讲《百法明门论》;唐大圆、张化声于武汉大学讲《唯识三十颂》;景昌极、李证刚于东北大学讲《唯识论》;梁启超和王恩洋则分别于清华大学和四川大学讲佛学。从此,佛学逐渐进入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领域,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专著里,佛学思想也被列为重要内容而有专门介绍,如梁启超在讲中国学术史时专门讲了佛学;胡适、冯友兰在编写中国哲学史时写了佛学。中国佛学终于在近代人所著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占了极其重要的一页。

近代学者在佛学研究中的成就是巨大的,而杨仁山居士,则可称近代佛学研究的开拓者。他广搜亡佚经典,刻印流通,提倡义学,创办僧学堂,培养佛学研究人才,耗尽了一生的精力。后来其弟子辈有许多人在法相唯识学的研究上有所成就,都与他的提倡与改革有关。杨仁山的弟子欧阳竟无创办支那内学院,聚众讲学,更是培养了一大批佛学研究人才。先后跟他学过佛学的,比较著名的有梁启超、吕澂、梁漱溟、陈铭枢、王恩洋、汤用彤、熊十力等,后来都在佛学研究中有很大成就。

总之,佛教传入中国后,两千多年在中华大地上,得以慧灯长明,薪火相继,除了广大僧伽奋发着力外,“与佛有缘”者亦功不可没。对于前者,历朝僧传、寺志中记载颇丰;而后者的事迹,往往缺少系统、全面的整理。为此,我们经过长期收集和积累资料,从历代千余人中精选了百





名人物,编成《中华佛缘人物志》,荟萃英贤,通览古今,以略补这一历史缺憾。

本书的完成,走过了一段漫长而艰辛的历程:1998年,本书列入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课题,组织编写小组,并列出入志人物千余名。不久,由韦彦铎先生写出样稿数篇,经净旻法师审阅,在研究所办的刊物《正法研究》上刊出,供撰写者参考。一年后,陆续收到来稿三百多篇。经过编写组审阅,发觉不少重要佛缘人物,特别是近现代重要佛缘人物还无人撰写,应当继续发动。但由于撰稿人工作太忙,这个任务一直拖下来。直到2003年夏,台湾著名佛教学者于凌波先生来访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我与他谈起此事,得到他的大力支持,表示愿提供有关资料。他回台后,立即寄来他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一书,并盼我们的工作能早日完成。在他的鼓励下,我们又对古代重要佛缘人物作了查漏补缺,选出古今人物百篇进行加工。直到去年年底,才完成了本书的初稿。屈指算来,编写这本小书,足足花了十年时间。

限于水平,选录和记述恐有不妥之处,尚祈读者指正。

朱封鳌

2009年5月



序

释月净

佛教徒由出家信众和在家信众两大部分构成。出家信众称为僧伽,在家信众通常称为居士,即所谓居家修道之士。当年,释迦牟尼佛成道后即广收僧俗男女弟子,并根据当时的实际和佛教发展的需要,对僧伽和居士的地位、职责等作了相应的规定。概括而言,僧伽为三宝之一,具有住持佛教,传扬佛法,摄受、教化居士之责,居士则具有礼敬、供养三宝,护持佛教之责。这种自然的定位和分工,总体来说是既符合佛教发展的实际,又符合宗教发展的一般规律。一般来说,居士既是僧团教化、引导的对象,又是僧团的僧源所在和生存发展的支柱。僧伽和居士的互补与良性互动,促进了佛教的全面发展,由此构成佛教的整体形象。

佛教在传播与发展过程中,面对各种异质文化和不断发展的社会文明,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突出地表现在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的形成上,由此也使僧伽与居士的关系属性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部派佛教中,从《阿含经》及有关律典不难看到许多长者居士行善积德、修行证果的事例,从中也反映出佛教界适应时代、适应社会、入世度生的精神,表明居士的作用和影响;而在从大众部发展起来的大乘佛教中,反映以居士身行菩萨道、成圣成贤的事例就更多了,如《维摩诘经》、《华严经》、《法华经》等经中的维摩居士、善财童子、龙女等都是备受称道的“居士”典型,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居士积极修证佛法、弘法利生的热忱。这一方面是大乘佛教重视心法、积极入世、超然于形式和教条的思



想境界的体现,同时也是现实生活中居士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强的反映。

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居士的作用和影响愈来愈广,队伍也愈来愈大。社会各阶层人士中不少有权势、有财富、有学识、有能力的人物,诸如帝王将相、富商巨贾、硕学鸿儒、能工巧匠等等,他们有的自称居士,有的虽不以居士自居,但是都能积极护法弘法。所以我们把他们总称为“佛缘人物”。在历史上,每当佛教处于衰微之际,社会上常会出现重要的佛缘人物,联合高僧奔走呼吁,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以挽救法运。这样的例子很多:在古代,如梁武帝(萧衍)为了使佛门修持精进,作《断酒肉文》,又于天监十二年(513年),集僧尼1448人于华林殿,请法云法师讲《涅槃经》中食肉断大慈悲种子义,武帝与众席地同听。自受戒后,蔬食断欲,净如沙门。在近代,如晚清时期,我国寺院众多,僧人队伍庞大,但素质普遍低下,毫无生气。在西风东渐、国难当头之时,僧界几乎成了众矢之的,寺庙往往成为鱼肉的对象,佛教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幸有以杨仁山为代表的居士界精英大量刻印流通佛经,创办新式的佛教教育,宣讲佛学,提出革新佛教的种种方案,在政界、学界、教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一支独立于佛教传统僧团之外的令人瞩目的居士弘法队伍。由此可见历代佛缘人物在振兴佛教方面的重要作用。

朱封鳌先生长期从事佛学研究工作,十多年前在浙江省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工作时,即着手组织有志之士编撰《中华佛缘人物志》,初选自古至今有关人物千余,后为缩小篇幅,不断筛选,定100人左右。反复修改,最近编成。成书后,索序于月净。净深感佛缘人物在佛教发展史上地位的重要,并为朱先生的精诚发心所感动,故乐为之序。

2009年4月2日



目 录

MU LU

第一部分 古代(东汉至清)

牟 融	3
顾恺之	5
刘遗民	7
戴 逵	9
谢灵运	10
萧子良	12
傅大士	14
梁武帝(萧衍)	17
萧 统	20
张僧繇	23
隋文帝(杨坚) 隋炀帝(杨广)	24
展子虔	27
武则天(武曌)	28
吴道子	30
阎立本	32
李通玄	33
王 维	35
梁 肃	36
白居易	38

柳宗元	41
唐宣宗(李忱)	43
钱鏐 钱俶	45
王审知	47
杨 亿	49
范仲淹	51
李遵勖	54
晁 迥	56
王 随	57
富 弼	59
文彦博	61
欧阳修	63
赵 抃	66
王安石	70
张方平	73
杨 杰	75
马 玕	77
苏 軾	78
苏 辙	81
黄庭坚	84
王 古	87
郑 侠	89
郭 浩	91
陈 瓘	92
宗 泽	94
江公望	96
冯 楫	97
张商英	98

颜 丙	100
陆 沅	103
宋孝宗(赵昚)	104
钱象祖	106
吴克己	107
王日休	108
李纯甫	110
耶律楚材	113
元世祖(忽必烈)	115
宋 濂	117
唐 寅	120
虞淳熙	123
袁了凡	126
袁宗道 袁宏道 袁中道	128
清世祖(福临)	130
罗 聘	134
彭绍升	135

第二部分 近现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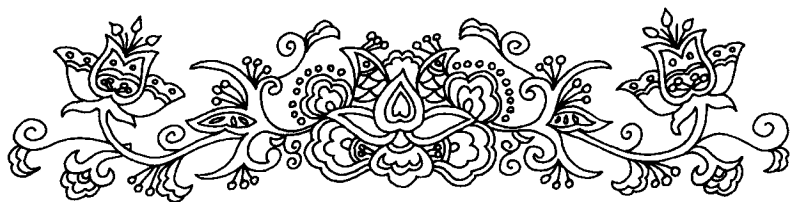
杨仁山	141
桂伯华	144
施省之	147
谭嗣同	149
王一亭	154
章太炎	158
简照南	161

欧阳竟无·····	164
江味农·····	168
高鹤年·····	172
蒋维乔·····	177
梁启超·····	181
丁福保·····	184
朱子桥·····	186
史一如·····	190
江 谦·····	192
徐蔚如·····	195
陈 垣·····	198
梅光羲·····	200
聂云台·····	203
范古农·····	206
叶恭绰·····	211
韩清净·····	215
熊十力·····	217
夏丏尊·····	221
陈铭枢·····	225
李炳南·····	229
汤用彤·····	234
吕 澂·····	238
王恩洋·····	243
梁漱溟·····	246
赵朴初·····	249
 主要参考书目·····	 253
后记·····	254

第一部分

古代

(东汉至清)



牟 融

牟融，学者。东汉三国时苍梧（今广西梧州）人。灵帝时天下乱起，他送母亲去交趾（今越南境）避祸。26岁回故乡，太守听说他博学贤良，拟召为幕吏，辞不就。矢志漫游，终身不仕。尝叹：“老子绝圣弃智，修身保其真，万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乐，故可贵也。”于是潜心佛学，兼研老子五千言，成为佛教初来中国时作出贡献的人。

佛法东来，始于汉明帝永平年间。《居士传》卷一载，帝梦见神人，身长丈六，项有日光，飞行殿庭。第二天，问群臣为何神，傅毅答：“臣按《周书异记》云：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平旦时大风起，宫殿民居震动。其夜有五色光，气贯太微，遍于四方，作青赤色。王问太史苏由曰：‘是何祥也？’对曰：‘西方有大圣人降生，后一千年声教被此土，今一千一十年矣。’陛下所梦将是乎。”明帝以为然，派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西行天竺（今印度），写浮屠遗范，携摄摩腾及竺法兰，持《四十二章经》，至洛阳。明帝在雍关西为立白马寺，从此佛教兴起。其后王公贵人祈祷日众，而佛理尚未弘明，许多学士大夫，囿于五经之文，将佛教斥为异术。三国初（约230年），牟融作《理惑论》，弘扬佛旨，对佛教东渐起到促进作用。

《理惑论》（又名《牟子理惑论》、《牟子》）仿佛教《禅行三十七品经》和道教《道德经》37章形式，自设宾主问答，解释佛教。其中大引佛经、《老子》、《孝经》、《论语》等书，阐述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没有根本对立，为中国最早的三教一致理论。“理惑”是三道的第一阶位（佛教修行三阶位即见道、修道、无学道），所要破除的是尘世之惑，包括贪、瞋、痴、邪等妨碍佛理的诸恶，是从凡夫俗子到圣者的修习阶位。到此阶位，方可





牟融

领悟四谛。牟融以自己對佛教的理解，採用賓主互答形式，寫了 37 章《理惑論》。他認為佛是一種謚號，猶如中土的三皇五帝之號。他對佛的描述，採用類似莊子對真人的表述：“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大能小，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污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認為佛法之道，在“歸于無為”，也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儒道的效用無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于無為”，“佛與老子，無為志也”，而無為必須“革情”，優婆塞（信佛的居士）當受“五戒”，沙門（和尚）當受“二百五十戒”。

牟融在回答“佛道于言人死当更生”的疑问时说：“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亡，得道身灭耳。”这是形尽而神不灭论。在此基础上，而有因果报应，“有道虽死，神归福堂。为恶既死，神当其殃”。释子修行必须削发出家，不娶妻生子，身披袈裟，不施跪拜之礼，这在儒家看来，都与礼教相悖。《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而佛教僧人要剃发；不孝以无嗣为最，而佛教徒主张不娶；儒教礼制对容貌服饰都有定制，而佛教徒身披赤布，见人 not 施跪礼。牟融认为，僧人削发只是权宜，终极目的是要达到成佛之境。不娶妻，乃是以清静无为作为修行方



法。同样,披赤衣,不跪拜是表示出家人不溢情,不淫性,唯以上德之道为贵,也是为了修道之故。追求上德,就无须注重形式上的礼节了,这叫“上德不德”。

总之,牟融《理惑论》的宗旨是想调和儒、道、释,使三教并存。他用儒、道学说比附佛教,虽与原教义有不相符之处,这正体现出佛教的中国化倾向。

※ 顾恺之 ※

顾恺之(348—409),东晋名士、画家。字长康,小字虎头。江苏无锡人。义熙中为散骑常侍,博学有才气。他的为人,世称“痴黠各半”、“好谐谑”、“好矜夸”,却又是“率直通脱”。他生于东晋穆帝初,他在绘画及艺术理论上卓有成就,不仅是六朝时代的杰出者,而且在中国绘画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顾恺之的平生事迹,古籍上记载不多,其中可以凭信的,就是散见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檀道鸾的《续晋阳秋》、丘渊之的《文章录》、许嵩的《建康实录》以及晋史中的《中兴书》等。其次就是辑录于《晋书·文苑传》中的《顾恺之本传》。在画史方面,就是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宣和画谱》几种。最可惜的是他所著的《顾恺之家传》(见《艺文类聚》)、《顾恺之文集》20卷(见《隋书》),均已失传,给后辈研究者带来遗憾。

顾氏,原为江南显族。顾恺之生于名门,父亲名悦之,字君叔,曾为扬州别驾,历尚书右丞;祖父名毗,字子治,在康帝时为散骑常侍,迁光禄卿;曾祖父也在吴晋做过大官。顾恺之自幼聪颖有才气,博览群书,擅长文学,工诗赋,多艺能,美书法,尤妙绘画。他是一位早熟的画家,

